

日本历史性城市公园的角色和可持续性发展 ——以东京日比谷公园为例

The Rol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 Urban Parks in Japan —Taking Tokyo Hibiya Park as an Example

徐夕子¹ 秋田典子^{2*} 李正祥³
XU Xizi¹ AKITA Noriko^{2*} LI Zhengxiang³

(1.湖南工业大学, 中国湖南 412000; 2.千叶大学, 日本东京〒105-0003; 3.清华大学, 中国北京 100084)
(1.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unan, China, 412000; Chiba University, Tokyo Port Area, Japan, 〒105-0003; 3.Tsinghua University, Benjing, China, 100084)

文章编号: 1000-0283(2022)01-0050-06
DOI: 10. 12193 / j. laing. 2022. 01. 0050. 007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21-05-17
修回日期: 2021-12-02

摘 要

有东京中央公园之称的日比谷公园是日本近代公园的鼻祖, 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通过历史资料梳理和实地采访, 以日比谷公园为例, 探讨日本历史性城市公园在其百年发展过程中作为重要城市公共空间的现实作用, 以及在可持续发展范畴下对城市公园发展的启示。研究认为, 作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 城市公园在社会、生活、防灾、生态结构等方面承担了补充和完善城市功能的责任; 作为城市历史文化和地域性传承的重要载体, 对于城市公园的评价方式和保护制度是影响城市公园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城市公园; 空间评价; 公园保护; 历史传承

Abstract

Hibiya Park, known as Tokyo’s central park, is the progenitor of Japan’s modern parks and has undergone more than a century of development. Taking Hibiya Park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al-life role of Japan’s historic urban parks as important urban public spaces that have assumed and complemented basic urban functions during their century-long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context of sustainable urban park development, through combing historical data and field interview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as urban public infrastructures, urban parks have assumed the role of complementing and improving urban functions in terms of social, living,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ecological structures; at the same time, as important carriers of urban history, culture, and regional heritage, the way of evaluating their creativity and the protection of laws are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 parks.

Keywords

urban parks; spatial evaluation; park conservation; historical heritage

徐夕子
1987年生/女/湖南人/博士/一级讲师/研
究方向为城市更新与公共空间

秋田典子
1969年生/女/日本东京人/博士/教授/
研究方向为城市绿地规划与土地利用

李正祥
1991生/男/山东人/博士在读/研究方向为
灾后景观

*通信作者 (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noriko@faculty.chiba-u.jp

日本建筑师芦原义信在《街道的美学》一书中谈到他所设想的日比谷公园的改造方案和其背后的原因, “这只是一个在立处城市中心, 却很消极的公园, 它应该成为更积极的开敞性室外空间——城市中心的广场”^[1]。而在传统造园家进士五十八的《日比谷公园: 向百年矜持学习》中写道, “芦原教授设计了面向日比谷公园的政府大楼, 因此对日比谷

很了解, 但从根本上说, 他是从公园‘外面眺望公园’。‘虽然它位于城市中心, 但却不是一个亲切的公园’, 他把公园视为城市中心的一个孤岛, 是从外面的视角或者说从建筑看向公园。他可能还没来得及进入公园, 悠闲地散步、放松, 享受音乐和美食。”^[2]

日比谷公园有着东京“中央公园”优越的地理位置,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 公园



图1 左: 大正时期促进实施普选大会; 右: 大正时期英国王子欢迎会 (来源: 日本近代可视化日比谷公园)
Fig.1 Left: Taisho-period general election promotion meeting; right: welcome party for British princes in the Taisho period (Source: Hibiya Park, a modern visualization of Japan)

图2 左: 大正时期日比谷公园平面图; 右: 大正时期音乐堂、云形池^[6] (来源: 目で見る日比谷公園100年の歩み展图集)
Fig.2 Left: plan of Hibiya Park in the Taisho Period; right: Taisho Period Music Hall and Unigata Pond (Source: Hibiya Park 100 years of Progress Exhibition)

中沉淀了大量珍贵的城市发展痕迹。文章基于造园家和建筑师不同的立场和视角, 通过日比谷公园大量的历史资料考证其所承担的城市“角色”。从白幡洋三郎以19世纪德国都市公园与日本都市公园的源流关系^[3], 到进士五十八在20世纪80年代对日比谷公园生活史考察的专题系列研究, 以此为原点展开百年发展的论述^[2,4], 20世纪90年代山下英也对内部空间进行研究^[5], 探讨城市公园的多功能性与可持续发展的要因。

1 城市公园的功能与角色

1.1 国家广场

用公园历史学家前岛康彦的话说, 日比谷公园可以称为“日本第一个西式国家广场”。正如古希腊的agora、古罗马的forum和英语中的piazza等词至今仍然存在, 自然形成的“广场”作为公共空间依然承载集会、以物易物的经济活动。城市对于国家来说, 是一个提供政治向心力的场所, 像北京的天安门和莫斯科的红场, 广场因政治形式的变化

可以成为激进的“政治空间”^[6]。日比谷公园无论是其作为首都中心公园的角色, 还是位于临近皇居的地理位置, 都赋予其文明的象征地位, 激发其像纪念性广场一样的社会与政治意义。在这一点上, 完全超越设计者的预期。日比谷公园有三个这样的“国家广场”空间^[2]——运动场、1923年建成的音乐堂和1929年竣工的公会堂。虽然两者并不是严格的广场性空间, 但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 承担了具有国家广场意义的政治性活动, 如日俄和约的焚烧声讨、大正时期促进实施普选大会、英国王子欢迎会 (图1)、宪法20周年纪念日、大正天皇银婚仪式等^[4]。

1.2 市民生活舞台

对于当时东京普通市民来说, “西洋”几乎是没有任何接触和体验过的未知世界。明治时期, 秋千、凉棚、喷泉、草坪、花坛都只能在如细川侯爵宅邸等新兴资本家、政治家们为中心的上层社会的宅邸庭园才能见到的折中式 (和洋折衷式) 和西式风格的景观元素^[7], 直到出现作为“公共空间”的日比谷公园。所以日比谷公园从诞生之时就为市民带来洋花、洋食、洋音乐, 让只看过鸢尾花、早春花、菊花的普通民众欣赏到了公园花坛中的郁金香和三色堇。而所带来的文化体验使它成为市民的“生活舞台”延续至今。1904年开业的法国餐厅“松本楼”也营业至今。对于当时的市民来说, 松本楼不仅仅是餐厅, 也是体验学习西餐礼仪、接触西方文化艺术家的沙龙空间。1909年10月在公园内举行了一场年轻艺术家的文学运动, 参加人员包括戏剧家小山内康秀、山本康秀等, 诗人北原白树、吉井勇等, 西式画家石井柏庭, 雕塑家高村小太郎, 音乐家元井长代, 歌舞伎演员市川贞治、市川英之助等。



图3 日比谷公园内部景观组图 (左：入口喷泉广场边界；中上和右上：松本楼前；中下：日比谷会堂与前大草地；右下：喷泉与音乐堂)
Fig.3 Group view of the interior of Hibiya Park (left: entrance fountain plaza border; upper center and upper right: in front of Matsumoto Building; lower center: Hibiya Hall and front large grassy area; lower right: fountain and concert hall)

请柬上说：“在大都市中心、靠近喷泉的地方，伴随耳际的音乐，边饮边聊天；一边用西餐，一边听着国外旅行归来的艺术家的故事。”“白色的桌布桌上摆放着鲜花，人们拿着刀叉品尝着西餐。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老百姓都渴望享受香醇的咖啡和茶。”^[2]而“音乐堂”作为当时陆军军乐队和海军军乐队演奏西洋古典交响乐的场所，总是能吸引大量听众^[8]（图2）。

至今日比谷公园仍然保持了当时的空间格局以及主要的景观轴线与节点，同时仍保存了作为城市重要公共空间对吸收和展示异国文化的职能。在工作日，公园是周边上班族十分青睐的休息空间和享用午餐的休闲绿地（图3）。

1.3 灾害避难所

1923年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7.9级），《大正地震史》记录当时东京的通讯、交通、

煤气、水、电力全部中断，9万余人丧生，46万户房屋被烧毁。松本楼在地震中也因地下厨房起火被摧毁。“记录中记载了因为所有通讯和交通被切断，人们只知道周围的情况，在没有水喝，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人们本能地逃向公园”^[9]。日比谷公园在第一时间收留了无家可归的人，原有的花坛、草地都被用来搭建临时帐篷。据记载，当时园内搭起了100个帐篷共计安置了3 008人。^{①[10]}。在地震发生后的两天，同时因为衍生的大火，来日比谷公园避难的人数达15万^②（图4）。关东大地震使很多人认识到公园和绿地在防止火灾蔓延和作为避难场所方面的作用。随即开展的帝都修复公园工程使近代公园设计的技术标准进一步完善^[2]，使近代公园设计的技术标准进一步完善，建立了日后日本城市系统防灾的基本框架。

在二战期间日比谷公园遭到军队侵占，成为战争的牺牲品。绿地被布置成高射炮

阵地，高大的树木被砍伐以保证能见度，包括本多静六恩请移植的悬垂银杏。随着粮食短缺越来越严重，公园的花坛、草地和空地被开垦出来，变成了种植土豆和蔬菜的田地，铁艺围栏被回收，儿童游乐区改建为防空洞，运动场上建军舍，原有功能基本丧失殆尽。而伴随着空袭的加剧，公园甚至成为战争中逝者遗体的临时安置场以及埋葬的地方^[4]。从和平时期现代公园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是超乎想象的，但这其实展现了公园的“极限功能”。进士五十八谈及战争时说道：“愚蠢的带来战争的政治家们，哪怕只要花其中一小部分钱给贫穷的人，都能给世界和平。然而作为一名景观设计师，你需要向大众传递信息，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的公园，还是一个悲惨的作为临时墓地的公园”^[2]。

1.4 融入城市绿地结构

历史上各地都曾多次出现过对于城市结构层面的美化尝试，最典型的是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城市美化运动”，受其影响，日本结合关东大地震后的帝都重建，建立了城市美化研究会^①，这是东京历史上首次现代美化城市的活动^[2]。

在2003年5月东京举行第一次“城市中心的绿地群”规划研讨会，主题是在市中心打造一个环状的绿地群，可以说这是一次东京绿化和文化双再生的运动。其构想是围绕皇居一周，打造一条景观轴线，将皇居外苑、国会大厦、霞关政府办公区等连接起来，配合国道、都道、区道形成绿化。具体方案是串联起日比谷公园、国会前庭、内护城河、皇居外苑、皇居东御苑、北之丸公园、千鸟渊公

①数据来源：小坂祐弘《松本楼的歩み一日比谷公園と共に七十年》。

②1923年9月1—2日，地震和火灾发生后，首都警察厅记录的人数名单，芝公园有20万人，皇宫外苑有30万人，上野公园有50万人。东京避难人总数157万，当时东京总人口217万，避难人数约占7成。

园等城市公园绿地作为城市中心更大结构的绿地群，成为更有识别性的绿地网络和步行系统，以发挥与周边公共绿地协调、生态网络建设、发挥防火功能，将分散的绿地管理统一起来，增强市民参与度。2009年3月，东京都政府发布了《东京都景观规划变更(草案)》(「東京都景観計画の変更(素案)－皇居周辺の風格ある景観誘導」)^[1] (图5)。其中，处于城市绿地新关系中的日比谷公园在城市宏观尺度上有着重要的价值。

2 城市公园的可持续发展

2.1 历史性公园的评价方式

在日本像东京丸之内地区的银行俱乐部、日本工业俱乐部等历史建筑(图6)，因特定时代设计细节和风格，被判定具有建筑史学价值，因而将由一代代专家学者进行保护和修复。与“历史建筑”相对的，是以保护为目的的“历史公园”。纳入城池遗址、神社寺院、大名宅邸庭园等名迹为公园，并对其留存的历史性和文化性进行评价。

在这一点上，准确地说日比谷公园并非真正意义的“历史公园”，而是具备“历史性”的城市公园。存在了一个多世纪的日比谷公园在规划、设计、材料、建设、管理、运营等方面都有其独特性。《日本公园百年史》中总结了日本造园界对公园历史多重性的评价，但仍然缺乏针对公园的创作性以及公园创作者的评价方法。对公园的历史评价更像是土木工程界的做法：把每个项目的评价作为“工程”进行分开处理，这与建筑界在以保护明治建筑为中心，接连发表对建筑师的作品、风格、个性的研究报告有很大不



图4 左：1923年震災期间公园内帐篷；右：二战期间公园内种土豆(来源：日比谷历史图册)

Fig.4 Left: tents in the park during the 1923 earthquake; right: potatoes grown in the park during World War II (Source: Hibiya Historical Atlas)

图5 东京都景观规划变更(草案) 皇居周边引用景观诱导区的地区分区

Fig.5 Changes to the Tokyo Metropolitan landscape plan (draft) zoning of the area around the Imperial Palace invoking the landscape induced area

同^[2]。他们没有像建筑界一样，建立对创作者的创造性、样式和风格流派的系统评价；缺乏审视与评价“创作者”的眼光，包括公园设计理念和设计范式^[2]。

明治建筑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需要进行改造时，即使使用目的和功能变化，建筑也会保留下来，即使无法保留整体，也会保留建筑的肌理。对于公园来说，则是

① 1925年10月成立城市美化研究会，次年发展为都市美化协会。



图6 银行俱乐部；工业俱乐部
Fig.6 Banking club; industrial club

图7 左上：云形池；右上：鹤喷泉；左下：鹈鹕喷泉；右下：悬垂银杏
Fig.7 Upper left: cloud-shaped pond; upper right: crane fountain; lower left: pelican fountain lower right: overhanging ginkgo

保留植物、空间形态、景观轴线、道路和水体，并将其融入创造者的理念之中。在日比谷公园内，有很容易判断的历史性元素，如S形公园道格局和其分割的功能性空间、日比谷公会堂和公园资料馆等建筑、悬垂银杏（首かけイチョウ）、鹈鹕喷泉（ペリカンの噴水）、云形池（雲形池）和鹤喷泉（鶴の噴水）、见附跡（日比谷见附跡）和心字池、公园道口等处的半圆形艺术广场、门柱等，每一个局部都具有自己的历史意义（图7），然而只有将它们加总才能理解与继承公园完整的“创造性”。如进士五十八在《日比谷公园：向百年骄傲学习》中所写，一个成熟的公园是隐藏在文化、艺术、历史、地域、社会特征之下的创造性“城市文化遗产”。

2.2 城市景观的保护法律

日比谷公园终得以被理解成一种城市文化的社会认识，是在于其保留了与市民关系的历史，同时也得益于法律对“文化遗产”宏观的保护。对日比谷公园社会价值和公园文化价值的延续，离不开《景观法》对城市公园的保护作用。至今日本政府对公园、景观的重视都是以法律先行、建立完备的法律框架为实施保护的前提。这类法律的目标和措施多种多样，有的以充分理解公园景观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为目标；有的是对现有的景观、绿地、公园提供保护措施或特殊修建措施；有的是为了促进现有城市公园、历史遗迹景观、风景名胜，以及对濒临消失的历史街区景观的保护和继承。按时间轴线对公园产生影响的法律如表1所示。

3 结语

城市公园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以东京日比谷公园为例，从4个方面展示城市公园在百年发展中，对城市所发挥的历史事件场所、灾害应急、结构性绿地设施等功能与角色，并从评价方式和法律保护两个方面整理和分析以日比谷公园为典型城市公园的历史资料，展示日本造园界对城市公园的继承性思考和保护措施。

在功能与角色方面，作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它是容纳政治事件的国家广场；是公民休闲可亲近的生活场所；是城市灾难下高效利用的应激弹性空间；也是城市重要的休闲、美化的步行结构性绿地组成，充分补充和完善了城市空间对社会、生活、防灾、生态结构等功能的需求。

表1 日本公园、绿地发展和保护相关法律
Tab. 1 Law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of parks and green spaces in Japan

年度 Year	公园、绿地相关法律 Laws related to parks and greenbelts	意义作用 Meaningful function
1873年	《太政官第16号公文》	近代公园制度的开始
1919年	《城市规划法》	通过规定城市规划的内容及其决策程序、城市规划限制、城市规划项目以及其他有关城市规划的必要事项,促进城市良性和有序发展,从而促进国家均衡发展和公共福利的提高
1919年	《历史遗迹与风景名胜保护法》	现行《文物保护法》的前身之一,涵盖的文化财产就是今天分类中的“古迹”“纪念物”,可禁止或限制某些行为,下令在某些地区为其提供必要的保护设施,并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
1939年	《东京绿地计划》	通过地区性风景公园系统来保护和利用景观,是一个包括大东京地区绿化带和公园在内的综合绿地规划,是日本城市规划和公园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专项总体规划
1950年	《文化财产保护法》	将园林和公园指定为风景名胜区加以保护,旨在保护和利用文化财产,将有形文化财产和无形文化财产进行分类;保护文化财产的部分费用由公共资金承担;由国家教育、文化、体育、科学和技术部长或文化事务局专员,都道府县长或市长指定、选择、认可或登记
1956年	《城市公园法》	制定城市公园的设置和管理标准,促进城市公园的良性发展,从而有利于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可将具有重要历史性、风景优美的土地发展为公园
1966年	《古城历史风土保护法》(古城法)	规定国家等为保护古城历史风貌而采取的特别措施,古城作为日本特有的文化财产,应当为后代公民所继承,并为全体公民所享有,从而有利于增强对国土的热爱,有利于整个文化的提高和发展
2004年	《景观法》	与同时颁布的《关于完善与园林法实施相配套的相关法律等法》《城市绿地保护法》部分修改法等一起,被称为“园林绿三法”
2005年	《国家土地形成规划法》	自1962年第一个国家综合开发计划以来,曾通过解决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等各种问题,实现国土的均衡发展,这些问题可以说是经济增长的压力、大都市的过度拥挤、农村的人口减少、社会基础设施的滞后等
2008年	《区域内历史风貌维护与提升法》 (历史街区营造法)	将“历史景观”定义为一个地区内反映其独特历史和传统的人们的活动、进行这些活动的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以及与周围的城市区域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良好的城市环境

日比谷公园一直延续“设计初衷”的道路结构、功能分区、空间格局以及典型景观元素等,是对城市公园“创造性”继承的典型范例。而作为超越“工程”和“工艺”的创造性文化平台,日比谷公园对城市历史文化和地域性的传承有着重要意义,对于公园的评价从“物”转向“创造物的人”,是对创造者知识产权的尊重与延续。另一方面,以日比谷公园为例,针对公园、绿地、街区不断出台的法律是日本在维护和保存现有历史城市公园、历史遗迹景观、濒临消失的历史街区景观等最坚实的底线,而建立综合性专业评价体系和完善法律是城市公园可持续发展得以保证的两个重要思路。



参考文献

[1] 芦原义信. 街道的美学[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2] 進士五十八. 日比谷公園: 100年の矜持に学ぶ[M]. 東京: 鹿島出版会, 2011.

[3] 白幡洋三郎. 近代都市公園史: 欧化的源流[M]. 李伟, 南城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4.

[4] 進士五十八, 鈴木誠, 水口聡子. 日比谷公園の総合的研究——歴史的積層空間としての日比谷公園の性格と生活史的考察[J]. 日本建築学会関東支部研究報告集, 1983: 145-148.

[5] 山下英也, 宮城俊作. 日比谷公園の設計案にみられる空間構成の特質とその変容過程[J]. J.JILA 58(5), 1995, 1: 13-16.

[6] 東京都建設局. 東京の公園110年[M]. 東京: 東京都建設局公園緑地部, 1985.

[7] 針ヶ谷鐘吉. 明治時代の洋風庭園[J]. 1936, 第一卷第二號: 93-101.

[8] 谷村政次郎. 日比谷公園音楽堂のプログラム[J].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Japan, 東京:2010, 6刊: 192-193.

[9] 緑と水の市民カレッジ. 「目で見る日比谷公園100年の歩み展」公益財団法人東京都公園協会、「東京グリーンアーカイブス」[Z]. 東京: 2009.

[10] 小坂祐弘. 松本樓の歩み—日比谷公園と共に七十年[M]. 東京: 日比谷松本樓, 1973.

[11] 東京都都市づくり政策部緑地景觀課. 皇居周辺の風格ある景觀誘導[EB/OL]. <https://www.toshiseibi.metro.tokyo.lg.jp/kenchiku/keikan/keikaku31.pdf>.